

乔安娜·德·格鲁特

伍 呷 译

康宏锦 译校

正确的概念和 错误的概念：讨论妇女与 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背景

〔按〕 荷兰人类学家乔安娜·德·格鲁特的这篇论文是对形成有关第三世界妇女参与发展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影响的审议。她指出，从17世纪到19世纪，欧美外来势力对当今称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层面，也涉及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她通过大量生动的事例说明，欧美势力如何在他们成功的优势上，建构非欧洲的，尤其是非欧洲妇女的“他者化”，从而形成对非欧洲妇女形象的歪曲：落后和低下。她还指出，这些错误的观点和负面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尽管受到过去二十年的妇女运动以及以

妇女为中心的学术研究的挑战和批判,至今仍然阴魂不散,不可等闲视之。作者呼吁要在现有的好作品的基础上,对有关妇女与发展的历史和历史编撰工作进行不断的挑战。

要想对妇女参与“发展”或妇女参与“发展”的经验,进行讨论或有所理解,都得恰如其分地强调这个问题的物质层面及其现实意义。然而,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历史过程的产物,正如发展的物质层面也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样。本文把当前妇女与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放在更广阔背景下,来讨论历史文化因素对发展政策的形成和运用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对于“发展中”或“第三世界”当今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情况和问题已形成普遍接受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不论是好是坏)受到屈从于上两个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的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西方对非西方人们的看法和设想的影响。从本文的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和态度都有着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也就是说,与男性角色恰恰相反的女性的性格特征和女性角色规定的具体定义和理解,是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冲突的焦点,也是为后者设计的控制和“发展”政策的焦点。

出现在本论文集题目中的“发展”一词,在新闻媒介、学术界以及日常话语里,已被广泛运用,然而尽管如此(也恰恰因为如此),慎重考虑这个词的内容、产生的背景及其含义,以便澄清我们对这个词的用法,显得非常重要。由于我们对这个词很熟悉,因而都自以为“懂得”它的意义;其实,这些意义及其根源都需要剥开来分析。本文将从分析着手,来叙述历史上“发展”的概念和运用是怎样建构的,而这种建构一般都是“外来者”对亲身经历“发展”的社会和人民的理解和评估,尤其是对女性角色和生

活的曲解和边缘化。我之所以强调历史上建构的概念,是作为对发展工作(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采取非历史和反历史态度的一种明确的批评,这种态度以“不受价值约束”的社会科学里含糊的概念为基础,以科学技术而不是以人的作用为基础,还以设想发展问题“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特征为基础。我之所以强调把所谓“不发达”社会当作发展“专家”或学术理论家的观点和政策的被动对象来对待的问题,是因为这种社会内部的实际经验和想法对于分析和推行政策显然很重要,因此忽视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不健全的,在实践中是百害无益的。我之所以强调对女性生活的边缘化和曲解,部分原因是因为西方的妇女学需要跟至今仍然影响着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看法的种种曲解和偏见分庭抗礼,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对于发展理论和实践来说,妇女的大多数(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应该是中心所在,而不是什么边缘问题。

80年代后期,研究与发展相联系的各种过程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当中,很少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简单明了、无可争议。由于过去的历史参差不齐,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五花八门,特定社会变化的方向和幅度也各有千秋,因此,“发展中”、“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区别只能作为一般的标尺。在第三世界经历各种危机的十年当中,从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非洲的生存危机直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计划危机,厄立特里、伊朗和尼加拉瓜的战争和革命的后果,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论是当地的还是跨国界的问题,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不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企业的问题,都可谓层出不穷。在计划、新技术或城市发展对第三世界的生态、经济和社区造成的种种不平衡的、经常是不可预测的后果面前,简单地把发展跟生活提高等同起来是

不能持久的,不论是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地带、东南亚地区出口制造业区、开罗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棚户区都是这样。最近有关发展的文章通过理论分析,通过对特定问题和社会的具体的和经验式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和困难进行了讨论,也提到一系列新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逐渐认识到妇女的重要性:妇女是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和“发展”中人数众多、与众不同、但直到最近仍然被忽视的人群。

本论文集是有关第三世界社会里妇女参与发展的问题。而我本人要做的是对形成这个问题的种种观点和讨论的某些历史文化影响进行审议。然而,这个题目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现在称之为第三世界社会的态度进行审议。这些不同的态度是这些社会跟外界影响和干预(物质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或文化方面的干预)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在当代史上越来越重要,不仅形成许多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也形成它们彼此之间的看法和理解。虽然不宜于在这里对这些发展情况做全面且细致的探讨,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有关妇女与发展的论争和观点的历史,大背景的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一提的。

那些今天被称之为“不发达”或“发展中”社会,大多是直到最近,仍然始终长期或一度处于外来势力——不是欧洲的就是北美的外来势力的直接影响和控制下。把这一点当作我们的起点,既重要,也很熟悉。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些社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日益扩大、日益强化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欧洲主导的金融商业网、政治关系、通讯以及领土和殖民掠夺为基础的。在这里不宜于详细叙述这个既复杂多样又相互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跟“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加勒比海奴隶种植园经济的兴衰,欧洲对亚

洲纺织加工业的影响,或非洲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过程是分不开的。但是,有必要在这里对发展政策和发展研究的历史以及妇女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的处境提出特别重要的几点。这些将通过具体实例进行讨论,而不打算做既乏味又无益的概括。

首先,“世界体系”这个概念不限于针对一些随意选出的买主和卖主之间、殖民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投资者跟生产者之间具体关系的组合,而是针对一个由物质、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这样,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就不仅是孤立的商业或领土扩张的历史,而是英国投资对家庭生产体系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政府对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干预。印度人被“纳入”世界体系包括出现讲英语的民族主义的专业精英,影响到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分工的新的法制框架和教育制度,以及农村生活和城市化的新格式。同样地,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是一系列复杂过程的一部分,包括:创立开拓者社区,法国在地中海的野心,法国成为欧洲强国,一系列企图驾驭当地精英和社区的尝试以及他们对这些尝试的反映。这是一个对诸多程序的相互关系以及多层面特征的评估问题,整体可能大于各个局部的总和。

这可以用更具体的实例加以说明。早在19世纪中叶在寻求商品贸易的过程中欧洲就开始对伊朗地毯加工业感兴趣了,当时伊朗经济跟欧洲市场的联系十分微弱,而英国和俄国对伊朗与其说是对经济感兴趣,还不如说是在战略意义上更感兴趣。这涉及到跟当地商人的关系,后来是跟地毯生产者的直接关系。由此,把一个以当地奢侈品市场和当地资源为基础的手工艺工业导向满足欧美消费的需求,进口染料和棉纱,以及欧洲对设计和质量的影响。伊朗的企业家们建立了生产体系和车间,重新

组织并加强了家庭劳动,雇佣妇女和儿童参加特定的手工艺辅助工作,以满足新的需求,并从新的来源获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以这些发展为基础的大规模出口工业不仅影响到伊朗很多地方的区域经济,也改变了城市生活和政治,因为地毯工人组织了手工艺协会,跟当地政府和欧洲领事讨价还价,并且作为一个团体对激进的民族运动进行干预。

如果要想把世界体系的成长跟对妇女和发展的讨论联系起来,那么,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与此有关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伊朗人和印度人在物质上和政治上跟欧洲的企业家、政府、传教士或军人联系的多样性和范围,不仅对社区和家庭的经济活动或日常生活的结构有影响,而且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都有影响。印度的耕种者受到土地、家族和权力以及税收的要求或市场压力种种新的关系的挑战。埃及和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客面临着印刷出版的报纸和电讯通讯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想要取代本土的教育、管理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有关教育和技术、社会和文化价值,这是一些新问题。虽然第三世界内部对这些挑战的反映(从对欧洲文化输入的热情到抵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对我们的讨论更有意义的是在跟非欧洲社会接触中,欧洲人的意识有所改变。

出现在当今时代的“发展”模式,部分基于19世纪这类接触的经验,基于欧洲社会内部激进的变化。随着经济、历史和社会学这些新兴“科学”学科的出现,对于变化做系统研究和解释的兴趣。欧洲参与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强化,不仅着眼于贸易、殖民化、投资或军事侵略,也着眼于建构对这个体系中不同社会的新的系统的解释。有着丰富的文献介绍这些新的解释是如何从实际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以及这些解释如何发展成为一批有实力

的观点和形象。这里只需要提出几点。尽管这几点不一定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肯定会对某些涉及发展讨论的有影响观点、假设和论争引起注意。

19世纪的欧洲社会经历了重大且迅速的变化。新的社会、政治和技术发展显然使他们跟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相同,这就为他们对这些社会形成新的观点打下基础。欧洲在经济渗透、领土攫取和政治军事干预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以有效地组织商业、外交或金融机构和新技术为基础的,似乎为欧洲优越感提供了经验性的证据。英法军队支持中国满洲统治者,英国在阿根廷修建铁路,在南部非洲建立采矿业,都是这种优越感的外在的、有目共睹的标志。俄国、德国或英国加工商品传入亚洲和南美市场,在非洲或秘鲁或奥托曼帝国所获的政治和领土优势,以及欧洲传教士、技术官员和游客遍及全世界,也是欧洲“成就”的类似表现。欧洲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改造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和关系所取得的“成功”加上他们以及在欧洲以外推广企业、军事或教育形式所取得的“成功”,形成了他们评判自己和与别人比较大背景。

欧洲对差异和优越的意识是通过一系列对立的定义和针锋相对的形象表达的。这些定义和形象加深了亚洲或非洲社会跟西欧比较时的负面概念,强调非欧洲社会的差异。如果欧洲经济活动形式被看做是动力十足和有进取心的,那么,对巴勒斯坦耕种者或马塞的游牧者的评价就只能是墨守成规和效率不高了。如果欧洲的政治生活被认为越来越受到宪法形式、公众舆论和理性辩论所制约,那么,印度王公政体或非洲酋长制就只能归纳为专横、腐败或暴戾。如果认为欧洲的政治机构通过渐进的改革和明确的道德标准在不断改进,那么,其他地方的政治机

构只能是落后、杂乱无章、差强人意。欧洲在评价非欧洲的农业耕作方法、家庭结构或政治活动时,不论是明确的评价还是含糊其辞的评价,总是说非欧洲是停滞的、紊乱无效的和落后的、腐朽的,而欧洲则是干劲十足的、井井有条的、进步的、道德上可取的。简言之,非欧洲从来没达到欧洲的标准。

这种负面观点的建构,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形象的混合体(“东方的,即为专制主义”,“原始习惯”,“异教信仰”)以及周详的学术成就。欧洲势力驾驭非欧洲势力的一种形式就是对非欧洲社会的语言、地理、习惯、历史或信仰建立主导的、甚至垄断性的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把殖民官员、研究和讨论人类学或东方语言的学术机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详尽的第一手记录、士兵或记者关于其他社会的“真相”统统放在一起,以建构“实际知识”的框架和专家鉴定,以此来定义和控制对这些社会的表述。这个框架跟另一个基于异国情调的、原始的、腐朽的或野蛮的视觉形象、文字形象或宗教形象建构的框架连接在一起。

因此,欧洲人一方面宣称他们对非欧洲社会拥有独特的、特许的理性理解和知识,另一方面又说由于这些社会不相容的异己特征,他们无法得到完全理性的资料。关于非洲家族或伊斯兰法律和习惯的周详的研究跟“神秘的东方”或“黑色大陆”这类评论搅在一起,因此永远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或了解透彻,也许以研究这个领域的为其事业的几个“专家”除外。因此,欧洲宗教跟“原始迷信”或“非理性的狂热”完全对立,就像“东方专制主义”可以跟“正当”的政府相对立,或者“落后”的农业和金融体系可以跟有利可图、不断扩展的生产或投资相对立一样,把学术成就跟神秘化混为一体。

这种信息和想像、专业知识和幻想统统混在一起的做法,就

建立了非欧洲社会囊括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观点。功利主义改革家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保守的政治评论家菲兹加莫斯·斯蒂芬(Fitzjames Stephen)以及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都曾对印度次大陆进行讨论,把本土社会的局限性和不足跟英国统治提供的优越条件、使印度臣民获得收益和进步的希望做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在概括特征上,解释和评估上,可能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却都用同一个霸权主义的框架进行讨论。在对废除奴隶制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格式,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黑非洲都持有种族主义观点;在争论殖民扩张时,双方都受到非欧洲落后这种假设的影响。虽然,把非欧洲社会放在等级制度的低级地位,或放在正负矛盾中的负面,决不是一个简单或普遍的过程,但是却代表了19世纪末欧洲理论和实践的主导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对妇女问题和社会性别问题的讨论,就不单单是作为主题的一部分,而是从学术上和意识形态上建构非欧洲“他者”的一个中心问题。界定亚洲或非洲社会为原始或腐朽社会的关键是妇女在家庭里、生产上或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低劣地位。对此存在大量的数据和争论。这一表述,即使错误百出,也总是认为非欧洲妇女比西欧妇女处境低下。

英属印度的立法者把遏制焚烧寡妇、溺女婴及童婚作为在次大陆“改善”社会的总的使命的一部分,而他们把这种做法跟对印度的总定义——“低下”等同起来。传教士、游客和改良派常常夸大其词地描述中国的缠足,非洲的多妻制或中东对妇女的迫害,这些描述一味从道德方面谴责和做戏剧性的渲染,而不是分析或理解妇女生活中的法制、家庭或文化的框架。这些描述可能跟印度的教育运动或科罗莫(Cromer)对埃及医疗的改革

的讨论相联系,但他们总是把妇女的形象描绘成这些社会内在压迫的牺牲品。

关于伊斯兰法律或约鲁巴习惯如何对待妇女,或她们作为农业工人的角色、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或血统母权所积累的种种信息,跟一系列无处不在的有影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象和幻想交织在一起。这些并非来自经验性的观察,而是来自各种人类学理论、虚构的作品和富有想像力的描述,以及通俗新闻、精英艺术和广告所创造的视觉形象。

这类材料涉及的范围和数量在 19 世纪都有增长:有英国基督教和法国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所写的有关东非妇女受奴役经历的普及性记录;对半裸的黑女人和中东的舞女所做的新闻性描述,还配上漫画和插图;有各种各样的游览书,从有学术价值的到刻意轻浮的、按俗套描绘的女性角色;还有为富有的城里人准备的高档绘画以及像赖德·赫格德(Rider Haggard)那样的小说,供更广泛的中产阶级读者享用。他们用占压倒优势的欧洲宗教和世俗的意识形态,从虔诚的罗马天主教义到左翼自由渐进政见,来加强各种价值观。中东闺阁里的,或美国奴隶种植园里的,或是赖德·赫格德的非洲的具有异国情调的激发兴趣的妇女形象,并不是研究和理性分析的产物,而是西方想像的产物,这种想像中的形象有着强有力的目的。欧洲的游览手册和沙龙里的绘画,跟可以称之为“闺阁”的开罗或伊斯坦布尔的贵族家宅里有关妇女的实实在在的所闻所见毫无共同之处。废除黑奴的小册子和小说里充斥着对黑妈妈或性感女黑奴的描述,跟非洲裔美国女人在庄稼地里干活的突出经历相距甚远。东方的舞女或非洲的巫婆或波利尼西亚从事性交易的女人可能是代表非欧洲女性的最著名的“类型”,当然还有受践踏的妻子或“无

知”的乡村接生婆;这些对非西方世界妇女处境的复杂现实揭示得很少。然而,恰恰是这些陈规俗套而不是现实,影响着严肃的决策或学术成就,也影响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信息、想像、实用的自我利害和偏见加在一起,形成了对非欧洲妇女公认的形象,对她们的政策以及整个“落后”的定义(后来,称为“不发达”),就是欧洲社会所了解的非欧洲社会,掌握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些妇女作为母亲或生产者的角色或约束她们的社会举止的规章达不到欧洲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模式,因此,她们的情况一定比欧洲妇女“低下”。妇女的“低下”是整个非欧洲“低下”定义的一部分,因此跟妇女有关的各种争议和行动也是欧洲企业、帝国或传教战略的核心部分。“土著习惯”不可动摇的力量和/或市场势力所具有的充电能力或殖民统治或西方式的改良/信奉基督,所有这些形象都是讨论和推行欧洲战略的关键,并辅之以政治上的慎行或家长统治或改良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也构成了有关妇女在家庭里、生产工作或社区里的“恰当”位置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加强了对妇女的讨论和对整个非欧洲社会讨论之间的密切联系。科罗莫 1909 年对埃及妇女要对婴儿死亡率负责的论断,尤其反映了英国当前讨论的趋势。

当然,一方面把第三世界妇女建构和描述成具有异国情调的人种,而另一方面又把她们说成受压迫的牺牲品、性对象或“落后”社会里最无知、最落后的成员,这当中存在很多矛盾,也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描绘出栩栩如生的形象可能跟做出道德上或“科学”上的论断或经验性知识的表述有矛盾。但是对妇女的表述在对整个第三世界社会的概括中占据核心的地位,也形成欧洲男性跟这些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些形象、论点和解释既无孔不入,又具有说服力,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从学术研

究到通俗媒介文化,从正式的决策到色情幻境都如此。由于这些对妇女的建构和表述已经通过教育、娱乐、艺术和宗教进入了欧洲文化的主流,因而能够使人们从文化上受到影响,而这些人受了这种文化熏陶,长大成人,并且成为决策人、传教士或行政官员,由他们来规定第三世界社会里妇女该怎样生活。除了对这种情况的重要含义充分领会以外,对西方对非西方妇女的看法存在的某些问题、矛盾和复杂性进行审议也很重要。

关于这些观点,有一点既明显又很重要,需要提请注意。虽然这些观点仰仗了欧洲学者、游客和殖民官员的“知识”,但是实际上,却对非欧洲妇女生活现实情况提供了不正确和片面的表述。这些表述,不论是学术性的还是具有异国情调的,都舍弃了充分的调查和分析,一味强调欧洲人跟非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这样,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闺阁风俗或非洲或印度的多妻制写出一些有道德意味或有异国情调的著作,而没有正确地描述或解释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这些风俗维护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城市商业活动或贵族家宅和世袭相传。欧洲中产阶级在印度或中东见到“包办”婚姻时,对此做了不少评论,说是一种具有异国情调而又生疏的风俗习惯;然而,所谓“自由选择”的婚姻在19世纪欧洲也是一种最近开始且不普遍的做法,这些评论对这一事实不屑一顾。同样地,不论是英国或法国的农村或上层家庭里,还是在安纳托利亚或旁遮普,家庭、财产和社区利益(而不是个人或情感因素)才是婚姻的核心,对此这些评论也忽视了。

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所采用的悲惨的黑人母亲的形象并不是来自美国南部种植园黑女人的亲身经历或东非的奴隶交易,而是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对母亲身份、家庭生活和白人基督教道德

(罗马天主教或福音派新教)的主要价值观。西方知识分子、传教士、专家和宣传人员所制造的他们跟“他者”之间的容易造成误解的分歧,既掩盖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特定社会里妇女所处的复杂情况,又混淆了对这些情况进行严厉批评和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如果因为强调了非西方人的“他者”状态,而不能对非西方社会里的妇女做出恰当的描述,看不见对她们生活的诸多影响,也看不见欧洲和其他地方社会和历史上存在的相似之处和差异的话,那么欧洲人一贯主张非欧洲社会里妇女“受压迫的状况”证明她们的低劣,这种看法本身就包含一种讽刺意味。欧洲在讨论19世纪印度、非洲或中东妇女时,重点放在法律上、宗教上、社会上和教育上对她们的约束和限制,以及她们在工作场所和家庭里所受的压迫。但是,在对非欧洲社会的妇女地位做出清醒评估的时刻,完全有可能像现代人所做的那样,从可相比较的约束和压迫角度,对欧洲妇女的地位进行讨论。英国和法国的法律限制或剥夺已婚妇女取得财产、离婚的权利,或向法庭诉讼的正当权利;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存在剥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专业训练、选举权或任职权等类似的限制;工会和雇主通过排除法限制妇女取得技术、工作和适当的工资,英国对此有书面的“保护性”立法;不许参加工会、政治生活或经济独立等议论的背后是广泛被接受的信念:妇女的“天性”就是承担家务和生养子女的角色。

虽然欧洲的这类情况跟伊朗、尼日利亚或孟加拉的情况具体来讲还有所不同,有时也受到那些深感压抑的人们的抵制,但这些情况肯定说明,把欧洲妇女的情况与据说是比欧洲低下的地方的妇女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的确,在特定的事例里,

比如,塔克尔(Tucker)的书描述了19世纪埃及法庭上妇女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情况,比较的结果显然是对非欧洲有利。

首先,欧洲人对非欧洲社会的妇女情况所做的片面的和/或带有偏见的分析应该理解为权力关系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无知或偏执。欧洲人对非欧洲人、尤其是非欧洲女人的观点反映出他们在物质上和文化上的统治,这不仅反映出世界体系中欧洲男人强大集团的控制,而且反映出社会性别和阶级力量相互联系的格局,维护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以及有产阶级和特权阶级对劳动大众阶层的统治。生产组织依靠多层次的权力结构。资本主义纺织工业的运转靠的是种植园黑人以收成交租或当奴隶,埃及农业和兰卡斯特纺织厂的性别劳动分工,创造私人利润和社会生产的不同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工资和市场力量,也依靠采用排除法或合作法的政治制度,不论是美国南方后重建运动的权力结构、英国男人享有特权的扩展或英国19世纪80年代建立对埃及的统治。这些权力结构,从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来说,都是由体现差异和劣等的理论、信仰和形象确认和代表的。这些理论、信仰和形象常常跟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连在一起,比如,新闻记者对伦敦贫民窟的描述,取名为进入“最黑暗的英国”的航程。有关女性生理弱点的医学讨论却出现在通常跟种族问题有关的人类学期刊上。有关阶级、社会性别或种族的等级制度和不等概念,在文化和物质层次上,不仅仅是平行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

非西方人和女人(西方和他者)往往通过形象和有关她们“孩子般的”、“不发达”的特征,被理解和描述成未成年的人;一些医生和像拉斯金(Ruskin)那样的文化评论家的描述,和很多

主张废止奴隶制和反对废止奴隶制的文献,都强调她们“重感情”、“不理智”、“凭本能”的品质和举止,因而不承认她们是有理性的人。成年人的身份和理智总是同时跟上层的、白人的、男性的经验和世界观等同起来,以保证女人和非白人看上去既不同(他者),又低劣,根本“达不到”也“没有能力”取得跟白人男人一样的经验和观点。这些观点解释并为排除女人和从属的“种族”、不给他们得到物质的机会、政治权力或个人自治权进行辩解,也把她们紧紧地拴在以下这种论点上:由于她们具有非成人和非理性的特点,因此需要上层的、白人的、男性的保护、控制,并受他们统治。

另一方面,这种论点和理论十分顽固,不仅坚持男人统治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而且表达了那些推崇这些论点的上层的白人男人根深蒂固的矛盾、需要和焦虑。如果把我们所讨论的观点纯粹看做是维护某种权力结构的工具,就会忽视其全部含义以及这些观点在西方文化里的全部影响。如果有关非欧洲或女人的劣势的形象和理论允许上层的白人男人享有统治这些群体的权力,那也允许这些男人表达处理他们对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和“重情感的”人的矛盾关系:既想占有她们,又认为她们“低劣”。这种矛盾的情感出现在小说里——从华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小说到赖德·赫格德的《她》和《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以及游览文学。控制和统治别人(雇员,妻子,殖民统治的臣民,社会地位低下者)的能力和权力,部分基于用工作纪律、学校纪律和权威克制感情、“弱点”或欲望,从而形成的自我控制力。连篇累牍地讨论和描述女性特征或“异国特征”,将其说成既迷人又低下,这正反映出这个过程和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力量之间的矛盾。恰恰是在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整体中,把实

际和个人的需要、内部和外部、幻觉和经验性学术成就,以及“事实”和“虚构”混合在一起,才使得有关非欧洲妇女的概念和形象具有持久和普遍的影响。

强调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遗产及其物质上、智力上和感情上的支撑作用所具有的力量和顽固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常常假设,以上讨论的观点在20世纪末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然而,在后殖民幻想破灭的年代里,在发展前景黯淡的年代里,剥削国际化的新水平、新的抵抗力量,以及以上跟我们有关的许多观点至今仍在论争和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19世纪非欧洲妇女和她们生活的表述、定义和解释的每一种形式,从学术性最强的到最通俗的形式,都在20世纪对妇女和发展所采用的社会、科学和政策的路线产生持久的影响。在“发展”领域里,现代学术研究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经济或行政机构,仍然依靠以欧洲为中心、对社会性别视而不见的基金会,使用充满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学术观点,这一切却都通过计划工作者、研究人员和专家“不偏不倚”的语言表达出来。

20世纪对“发展”的讨论,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科学家和决策人,无论是在研究西方社会或是非西方社会时,都使构成人类一半的女性无影无踪。经济学家在讨论“就业”、社会政策的形成,社会学家在讨论“家庭”时,不是认为某种权力、资源和角色的划分方法是“自然的”,就是认为这种划分的方法对妇女和家庭并不重要。在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实际工作和分析工作中,对家庭和政治组织里存在的按性别的劳动分工、男性权威和特权,以及法制、教育或福利机构对妇女歧视的现象,根本没有加以强调。妇女得不到具有物质和政治实权的职位这一点,似乎证实了她们在这种工作中处于边缘或从属的状

态,根本没有优先考虑她们的经验和利益。

社会科学研究和写作采用的现代方法和语言(非个人的,“客观的”,数量的,技术的),加强了对社会性别视而不见的理论和实践,不光是通过明显的偏见和模式化,而是通过“科学”地使用中立的、抽象的概念和假设。在英国政府的统计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里,普遍用“他”来描述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的群体,以及使女人生育和从事家务混淆不清的情况,比比皆是。不仅如此,不论是通过西方的法制和社会改革,或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妇女情况的改变都助长了这样的观点,即,妇女解放和生活质量,或至少是妇女“进步”,已经或正在实现,因而不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了。

虽然20世纪中的经济学家、计划工作者或社会科学家所采用的方法、设想和概念跟19世纪肯定不同,但是,早些时候的观察家、理论家或专家就西方和非西方妇女研究所留下的遗产,对于他们的现代继承人的成长是有影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中,女人还是被安置在家庭生活的圈子里,对性欲和社会性别差异的不同形式的讨论还是着眼于道德,这跟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术成果没什么两样。比如,60年代对发展的研究对妇女在生产工作里的活动不屑一顾,因为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非洲,“工人”的概念是男性的,反映出19世纪和20世纪妇女在西方的工作场所是被排除在外或边缘化的。同样地,殖民官员和发展计划人员或人类学家对妇女作为有产者或企业家的活动不闻不问,对究竟有多少妇女在这些领域里活动,以及他们希望有多少妇女在这些领域里活动,他们的设想完全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货色。不仅如此,当妇女成为社会科学或社会决策的对象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关她们的性别和婚姻家

庭情况的。19世纪人种论和人类学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靠的是非欧洲世界存在的妇女从属于多妻制、奴隶制或闺阁的异国情调风俗习惯和幻想,就像宗教和现代社会科学把西方妇女模式化,把她们的角色限于母亲、妻子或性对象一样。

这种情况在过去二十年里由于妇女运动的发展和以妇女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而受到挑战。

一方面,在历史、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里受妇女指导和女性主义的研究、理论和论述提出,对全世界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缺乏经验性和分析性的理解。很多社会的妇女在物质、政治和个人解放和赋权方面的实际需要与不仅在学术机构,而且在地方、国家和国际机构中开创的妇女研究以及对发展政策和计划的实际关心相互影响。这样,知识、社会变化和政治行动跟一系列主动积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这给妇女提供了优先地位,不再用边缘化和看不见的特征来描述她们的生活或对她们的生活进行调查和分析。一个有发展工作经验的女性主义研究人员和作家,本应该介绍妇女在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还应介绍她所处的社会里妇女在政治和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情况,却编撰了一份通俗的女性主义的杂志,这一点,说明了这些新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另一方面,由于妇女在男性统治的社会和文化里处于“看不见”的状态,女性主义需要对那些社会里以西方为主导的决策、调查和分析方法中存在的完全“看不见”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的挑战,却常常以失败告终。社会科学、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社会的做法中遗留下来的偏见跟不把第三世界妇女当作生产者、培育者,当作人和公民的偏见所造成的后果结合在一起。她们的物质需要,法律上的权利以及社会上的机会

在优先次序上统统排在后面,并且把她们放在来自这些偏见的家庭、社区、经济和社会里,认为她们是“落后”、“传统”、“女性”的活动、身份和地位的范畴里。在这种情况下,非西方妇女受到双重的边缘化和曲解;然而,正如“男性”偏见一直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多种挑战的对象那样,充分承认第三世界妇女的政策和学术成果受到主流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肯定。这既包括大量对第三世界社会和历史所制定的不恰当的发展政策和分析的批评,也包括在建构对特定非西方社会比较恰当的理论 and 实践时,对妇女的存在、需要和利益加以肯定。

这些批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跟这里提出的论争一样,建议为妇女和发展的讨论制定更有用的基础和指导方针。这些讨论决不能接受重复对发展研究和决策有影响的对社会性别视而不见的种族中心主义看法,而要针对妇女生活真实的复杂性加以分析。为了纠正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边缘化和曲解,需要讨论几个主要问题。讨论妇女一方面在她们自己的社会里,经历双重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结构和过程;另一方面又受到外来经济的影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干预,外国专家、改革者和外国样板和标准的影响。妇女在她们自己的社会里,不得不对付由男性和阶级力量形成的结构和做法,这些又体现在男性长者和亲属的权威上,体现在地主、雇主、家族群体和政府官员和政治经济统治上,以及对“恰当的”女性角色和举止的文化的(宗教的,世俗的,精英的,通俗的)定义上。在印度的等级制度里,在西非乡村社区或拉丁美洲的城市贫民窟里,这样的结构和做法,自古以来一直用来规定妇女的生产、婚姻、儿童培育、教育或妇女状态的模式,并且继续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家庭经济策略和现代社会及政治活动。

然而,其他外来因素对特定社会内这些历史上和当代的程序曾经进行过对抗、共存或改造。日益扩大的变化的世界体系对许多地区的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对妇女的生产活动,她们在特定国家内和特定国家之间的迁徙,以及她们在消费和服务方面所担任的角色,都有影响。过去行政官员和传教士的干预以及当今西方专家和计划工作者的干预,都有助于重建社区、家庭和法律教育制度。不仅如此,把来自西方经验的“发展”或“进步”的模式和标准搬过来,加上对他们自己社会的分析,不假思索地运用到所有的社会,这些都改变了妇女的生活,有的好,有的坏,譬如使用有关财产权的某些概念,或某些技术概念,或西方的保健模式、扫盲模式或城市规划模式。不论我们是在思考肯尼亚农村妇女如何对待东南亚男性工资上涨和妇女参与出口工业的后果,还是在思考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立法削弱妇女对土地的权利,我们都是在观察一个由外来经济影响或模式发挥建构作用的过程。对这些过程进行调查和分析,应成为妇女经历和参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这些经验和投入需要根据本土和外来影响的相互作用才能理解的话,那么,妇女的选择,不论是物质的、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选择,都应该是这个讨论的一部分。土耳其或加纳或菲律宾妇女的生活是由阶级、社区团结和矛盾形成的,是由男性的利益和权力、家族制度以及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的。因此,她们具有多重身份,别人也这样看她们:在跟男人打交道时,她们是具有社会性别特征的人;跟地主打交道时她们是耕作者;跟雇主打交道时她们是挣工资的劳动者;跟客户打交道时她们是商人或是专业人员;在等级森严的家族群体里,她们是妻子、母亲、姐姐或妹妹,而在跟政府打交道时她们就是政府政治控制和社会

经济政策的对象。的确,可以说阶级或家族或种族身份或社会性别这些概念最好理解为实际形成每一个人的身份和差异,这样,“工人”或“公民”的概念应该加上社会性别,再注上文化特征,就像女性身份或不平等的概念应该加上阶级或文化内容一样。

妇女拥有重叠的、相互矛盾的和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复杂身份,清晰地说明她们同样复杂的需要和问题。她们对家庭的承诺使她们跟男亲属的关系处于不利的地位,但也有一种保护她们的利益不受亲属侵犯的作用;工会组织,反对殖民主义活动或乡村抗议活动既为妇女创造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也造成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利益从属于忽视妇女或使妇女边缘化的“阶级”政治或“民族”事业的矛盾;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不充分表达阶级、社会性别或文化利益,就像家庭和家族利益既促进也限制了其他利益和身份。

任何跟妇女和发展有关的研究、分析和决策,都应既澄清社会性别分工、不平等和矛盾的重要性,也澄清社会性别跟在资源、权力和影响方面的其他不平等现象之间交错的现象。这些不仅仅需要从形成妇女生活的结构和条件去讨论,也需要从妇女对她们自身的意识、她们的情况以及她们的利益去讨论,还要从妇女从过去到现在形成的真实而矛盾的位置、选择和承诺去讨论。30年代以来在印度反对殖民统治,50年代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统治或70年代在津巴布韦反对殖民统治斗争的成长和后果造成的妇女矛盾,都应该看成社会性别、民族主义、等级、宗教或家庭之间矛盾的产物;妇女在生产 and 生养子女上不利的地位,不论是在1949年后的中国或种族隔离的南非,都应该理解为经济需要、家庭利益、国家干预和男性权力之间复杂的

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伊朗或拉丁美洲，从意识形态到实践，对妇女突出性别和家务，也只能理解为男性自身利益、文化上和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以及争夺资源、地位和自治和社会经济冲突的同样复杂的相互作用。妇女不得不对付这些复杂的现实情况，并且在各种限制条件和可能的机会下，根据跟她们有关的优先次序，对她们的生活做出困难的选择。对妇女和发展进行讨论，需要考虑选择和情况的辩证关系，不把第三世界妇女看做被动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牺牲品，或外来势力或当地条件的牺牲品，而看做这种辩证关系的积极参与者。

发展理论和实践，一方面需要从女性主义研究里得到启发、证明和分析，以便把妇女正确地显示为积极的主体，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学术上和政治上讨论对有关妇女的讨论有影响的种族中心主义。正如我们不再接受社会科学从主张欧洲中心论的19世纪前人那里继承的有关非西方妇女的偏见和看法，同样地，我们需要根据她们本身的情况，而不是根据其他地方制定的议程，来探讨非西方妇女的情况。需要对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及其问题、需要和愿望所面临的历史情况和现状有关的主题和问题认真考虑。对有偿劳动和工会的关心未必适合在无偿的家庭环境里从事生产工作的妇女。在中美洲或南非，有关公民身份和参与的政治问题不一定需要跟西方妇女的重点一样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或政党政治上。在印度或北非，讨论家庭暴力或教育方面的歧视，就得跟在欧洲或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有所不同。

这并不是要强调某种达不到的、事实上是不可思议的绝对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要对妇女的处境做周到的、完全是比较性质的分析，并且对相同和差异都能做出解释。许多社会的妇女围

绕家庭和家务的承诺、劳动分工和性别问题，为她们自己形成比较性质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对形成这些问题的特点和共同因素的理解，却需要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实践中得到。

因此，掌握比如解放后的加勒比海或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印度或西非的具体的和不尽相同的家族史和财产史，以及这些情况又如何影响到妇女生养子女、生产、婚姻和社区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地，妇女在农业上所扮演的角色，需要从东南亚稻米种植的具体历史和结构、伊朗的畜牧经济或各种以犁锄为基础的粮食生产里面了解，正如她们参与加工工业的情况需要根据生产上不同的组织和技术，从家庭纺织业到大规模跨国企业来分析。就文化和政治而言，我们需要，比如通过形成土耳其的伊斯兰势力和非宗教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拉丁美洲的民众抗议和乡村社区特定的宗教史、通俗文化史以及政治制度史和权力关系史，来了解隔离或排除妇女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承认描述非西方妇女所采取的方法导致了非西方妇女的共同问题的同时，对“非西方”或“第三世界”这些范畴进行挑战或解构也很重要，因为这些范畴掩盖了非西方社会妇女的各种利益和问题或使之神秘化。不做到这一点，就又会出现在我们想要消灭的边缘化和曲解，还会忽视不同妇女群体经验当中的重大分歧和矛盾。

然而，妇女和发展的具体历史和条件的重要性，跟在这些历史和社会情况中起作用的普遍和共同的经验和问题的重要性是相等的。殖民主义、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后果是最明显的，其本身就截然不同。需要分析的共同因素，是那些同殖民主义势力和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直接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进行干涉，把外来的压力或控制强加给个人、群体

和社区的因素。这些因素是许多社会和文化中妇女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的一部分。这些经验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的因素,即来自各种形式的男性权威所统治的家族和社区网络长时间对于家宅里、家庭里、等级群体或社区里的其他成员的生活的很多方面的控制。这种权威不但在很多社会里一直是彻头彻尾的男权控制,而且还集中在资深/老年男人的手里,在被称之为父权统治的经典模式下,对妇女和青年人施加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或影响。在对婚姻、生产工作和财产权的管理,对宗教和政治事务的权威,对形成社会交往道德和通俗文化的各种习惯、价值观和观点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父权统治的力量。

讨论妇女和发展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谨的比较。殖民主义也反对一夫多妻,反对以妇女为中心的生产,或母系社会制度(20年代一个人类学家贬为“不自然或怪诞”)。这应该根据形式和后果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分析。这些做法上的变化可能来自外部经济压力、社会改革家和传教士的影响或殖民主义的立法。这些外部的变化可能在殖民地社会内部,诱发新的意识形态和期望和/或保卫性质的抵抗活动,常常跟以男人为主导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在印度、中美洲、中东和南非的历史上,都能看到这个过程里各种主题和变奏,这也应该跟世界体系和殖民势力的多面特征,在经济、政治或文化上的局限、选择和控制能力联系起来。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对男权结构和表现中共同的和不同的因素做出解释。这包括对财产权的分析,对家庭关系和生产体制的分析,以及男性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的影响——从居主导地位的男牧师到流行故事和谚语,也包括对男权的文化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相互作用的分析,比如:从文化上对

女性的谦虚、顺从或孤立状态的引导,对妇女从事公共商业企业活动的的能力确有影响,取得的效果也完全不同,中东和西非为一例。然而,关心女性“正确和恰当”的举止和妇女在家族群体或男性统治的社区里的地位也同样重要。共同主题的出现,比如在扎伊尔、孟加拉国和塞内加尔等完全不同的文化的民间谚语里都有对妇女不信任的主题,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涉及到文化习惯是怎样形成对妇女具体角色(妻子、女儿、母亲)的期望以及妇女在价值的等级里所处的地位(低劣、不可靠、不洁)。

然而,对共同主题和变奏的探索,不仅是对妇女所受的剥削、支配和压迫的探索,还需要对妇女在男权结构里主动创造和维护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自主权的能力,以及叛逆、适应或抵抗的能力给予同样的关注。一个显而易见、值得讨论的共同现象是妇女网络在各种生产活动、社区生活或操持家务中的重要性。这样的网络,不论是在西非妇女商人的关系上,还是在中东地区对名誉和婚姻安排上正式和非正式的作用,或妇女配合参与种植业方面,都能显示出等级与合作的成分。有史以来,女性权威在家庭内部一个普遍的形式就是老年女人的权威,尤其是婆母,既是儿子的母亲,又对儿媳有控制权。自相矛盾的是,女人搬进丈夫的家宅,一方面打开一条通向既受尊敬又有影响的母亲/婆母的地位的大道,另一方面却使她大为贬值,不再是娘家的财富了。妇女团结的其他形式,可能包括保护妇女作为母亲不受忽视或虐待,由资深妇女执行女性行为准则,或传播和运用保健技术和服务。这些妇女参与活动 and 联系的不同形式,并不是某些特定社会独特的做法,这些形式对妇女生活和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其文化层次和物质层次的相互作用值得分析。

在为“第三世界妇女”这个概念寻找一个批评和比较的角度

时,有两点应该记住:首先,这个角度,一方面能够减少误导和过分简单化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细节上神秘化的危险。对“第三世界妇女”作为整体的概念持批评的态度,使我们能够避免忽视妇女在不同社会和文化里的不同经验,把她们看做“都一样”的错误。对多样性进行比较的角度,使我们自身能够避免神秘化和混乱,而不对差异和雷同作出足够的解释和分析。其次,比较和批评的角度使我们不仅能够对妇女的从属地位和不平等的特点进行充分的讨论,还能够把妇女生活的主动积极的方面、社会性别分析和其他形成妇女经验和意识的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这样就能使对有关阶级、社会性别和文化差异复杂而矛盾的形式进行讨论、对特定社会中外部和内部压力或变化的讨论以及对妇女接受或抵制对她们的影响或控制所采取的综合和不平衡形式的讨论,既灵活又连贯。

对妇女和发展的讨论之所以需要做到又批评又比较,是为了处理好多样性和相同点,但这些讨论也需要一个历史的角度,以便考虑长时间的变化。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从他们19世纪前人那里继承的经典而陈腐的模式就是把非西方社会描绘成墨守成规的、停滞不前的、没有西方援助就没有能力改变的社会形象。19世纪这样看,是为了殖民统治的利益,自由市场势力的利益,或传教士为显示使那些本身无力“进步”的社会所做的努力。到了20世纪,这个形象已经改头换面,成了一个把“现代”生产、政府管理或技术介绍给缺乏这些东西的“传统”社会。

许多历史学家或研究非西方社会的专家,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都把外部经济势力的侵入和殖民主义的干预作为这些社会重要变化过程的起点。然而,承认外部经济影响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非西方社会内部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早在这些

影响到来之前就存在了。影响这些社会发展的世界体系的扩大,加强并改变了变化的速度和性质;这不是说,在世界体系出现之前,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的生产体系、政治体系或社会关系体系里,不存在变化的条件和利害冲突。无论是奥托曼帝国经济结构的历史,还是西非国家形成的历史,都是这样。这说明需要把利用世界体系的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进行分期,与否认这些社会早在分期以前已开始和存在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二者区分开来。

同样地,对非西方社会里妇女经验的分析,也需要承认。妇女的历史并不是从现代殖民主义侵入妇女生活开始的。人口迁移和国家制度的兴亡对非洲或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妇女情况的影响,正如即将到来的游牧式畜牧业的影响或新的宗教影响对中东生活造成的后果一样,表明非西方妇女在跟西方接触以前的历史上出现的重大主题。早些时候,一直把影响妇女生活的内部和外部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看做她们参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只有历史的角度能够使我们正确了解这一点。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的影响,跟英国在东非统治的情况相比,只能用英国在这两个地区遇到的不同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制度来做一个局部的解释。有没有庞大的政府机构官僚主义、商业网络或正式的财产权这些前提,使特定社会里的妇女所经历的殖民主义和发展很不相同,这也是需要讨论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只有当非西方社会的妇女是沉睡在静止的“传统”制度里的睡美人,正等待西式“进步”唤醒她们这种神话破灭以后,才能进行严肃的分析。

如果对妇女和发展的讨论是想要使情况有所改善,那么,对现有的事例进行批评、使之非神秘化就很重要了;与此同时,这

个“负面”的方法也需要进行建设性调查的正面观点的支持来推动这个讨论。有三个领域是审议妇女经验有关的领域：如果在任何经济制度下再生产、发展和对人的劳动的使用以及妇女既参与生产又参与人口生产都是最重要的，那么妇女在生产体系和劳动分工中的地位问题，在大多数社会里可能是焦点；妇女的社会身份和跟其他社会差异形式（阶级、种族）相比，她们跟男人的差别对她们的身份有多大的影响，这对于了解相同与不同的法律、教育和习惯和建构这些复杂问题很有益处；性的问题，作为妇女生活一个重要的方面，性的发展和不同文化、社区和国家对性的规章制度，也提出影响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政治生活和社会关系的重大的一般性问题。围绕妇女的需要和利益，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分析，并采取行动，就能使我们的讨论向前推进，超过直到最近还存在的种种限制。

一个具体的事例可以表明我们正在取得的进展。朱迪斯·塔克尔(Judieh Tucker)所著的《19世纪埃及妇女》是一本关于埃及历史上特定时期妇女生活的著作。这本书对妇女的经济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以此对西方流行的关于埃及妇女消极被动、停滞不前和备受压迫的神话进行挑战。这个调查不仅说明妇女大量参与农业生产、家务服务、手工艺加工和小商业，还说明她们跟家族群体、地主、社区和政府官员的复杂关系。妇女在法庭上和社会抗议活动中为保卫她们的权利所采取的行动得到详尽的分析，对她们在贵族家宅和娱乐行业生活的具体描述，有力地反驳了对东方闺阁和舞女的令人压抑的、不正确的老一套描述。妇女的生活也处于埃及日益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和外国政治干涉的框架内，妇女的生活正在改变有关妇女屈从于男权、统治阶级和殖民统治以及她们的自我

活动，还有她们在家庭、职业群体和邻舍的地位的复杂叙述。虽然这个叙述的某些方面或重点是可以争议的，但是整个叙述把复杂性和连贯性结合得很好，不仅如此，还使读者能够把这本书的历史分析跟埃及妇女后来的经验和当代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个叙述把以经验为依据的方法和进行分析的方法连在一起，把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和其他问题连在一起，这就为我们主张的方法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的确，这些积极的建议决不是凭空而来的，恰恰相反，都是来自最近在发展研究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更尖锐的批评、比较和富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和实践，把重点放在妇女身上。塔克尔的作品只是一例。现在有一批有关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对发展问题更广泛的探索的作品，为我们在这里提出疑问的以陈旧假设为基础的作品提供了出路。这些新的方法不仅严肃地对待以前被曲解的和边缘化的妇女生活、观点和活动，而且把妇女情况放在历史上和当今社会性别、阶级和社区以及内部/外部影响的复杂背景下来讨论。新作品的内容包括对伊斯兰意识形态对待妇女的分析一直到讨论合作生产体系或小企业如何帮助妇女从物质层面找机会。新的作品引用了有关加勒比海的奴隶制、印度的等级制或中东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著作。这些作品还运用了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社会性别、阶级和身份等概念。这些作品多样化，有争议，并且积极参加理论辩论和实际工作。正是由于这批作品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讨论由此引起的问题。

笔者的意图是想回避其他作家讨论过的主要问题，以期不仅仅就妇女过去的经验做出评价，而且对以前讨论妇女经验的作品做出评价。我们希望在対妇女真实的情况、需要和利益进

行研究、分析和执行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能够对有关“妇女与发展”的历史和历史编撰工作进行挑战、批评和改造。正因为如此,才这样强调对妇女和非西方社会的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历史形成。除非对历史和遗产明确提出批评,否则还会继续影响将来对妇女与发展的著作,因此对有关妇女与发展的讨论所做的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对于这个领域任何恰当和有用的尝试,都是不可缺少的。

瓦伦丁·M·莫格哈登

马元曦 译

康宏锦 校

贫困女性化?

——有关概念和趋势的笔记

〔按〕 本文作者瓦伦丁·M·莫格哈登 (Valentine M. Moghadam) 博士为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妇女研究专业主任。本文对全球性“贫困女性化”的问题进行探讨,从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造成“贫困以女性面孔”出现的原因及根源:(1) 女性单亲家庭的生长;(2) 家庭内部男女之间在各方面不平等,对女性的歧视;(3) 新自由化经济政策,包括结构调整、“灵活性”方针及一些后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型等。文章以不同地区妇女贫困为例进一步说明贫困女性化的严重性。本译文略有删节。